

灵州治城的变迁新探*

艾 冲

灵州城曾是中国北部边疆的重要城市。灵州治城有过四次移建,出现过五座治城。北魏孝昌二年废薄骨律镇改置灵州,初治胡城。西魏大统六年灵州首度自胡城迁至薄骨律镇旧城。明洪武十七年,灵州二度北移至灵州新城。明永乐中,灵州三度北移十余里,另筑新的治城。宣德三年,灵州四度迁至新的治城。

关键词 灵州治城 河渚 胡城 薄骨律镇城 黄河

作者艾冲,1955年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地址: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邮编710062。

在中国历史上,灵州城曾经是北部边疆的重要城市,既是北疆军事重镇、行政中心,更是边疆与内地间的交通枢纽、民族间文明交流的汇聚点、商货集散的经济都会。若干重大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座城市,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诸如唐太宗亲赴灵州城接见漠北铁勒诸部代表、唐肃宗在灵武郡城即皇帝位、仆固怀恩灵州叛乱、党项拓跋部首领迁居灵州(西平府)城等等。过去,每论及古代灵州的城址位置,学者大多采用“在今宁夏灵武西南”或“今灵武西南”的说法,以今宁夏灵武市为参照物表述其大致的方位。在无法确知古代灵州城具体地点的情况下,此说大体是正确的,但也是较为笼统的说法。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当尽力考定古代灵州城的准确位置,解决历史留给后人的这个学术悬案。笔者近年来查阅相关的历史文献、进行野外考察,并与宁夏地区的部分学者进行过坦诚的学术交流,下欲就历史时期灵州治城的地理位置及其移徙过程,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试做探讨,谨供大家指正。

一、灵州(州级政区)建立之前区域军政建制及治城简况

据历史文献记载,古代灵州作为州级行政建制单位始建于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间(525—527)。正如《魏书·地理志》载:灵州“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镇,孝昌中改[置灵州],后陷关西”。^①那么,在北魏孝昌之前的历史时期,今宁夏地区的军政建置又是怎样呢?

* 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211工程重点学科三期建设项目“中国古代文明研究”(批号: SXSD211003)成果之一。

① 《魏书》卷106上《地形志上》。

在战国秦汉时代,今宁夏黄河东西之地属于北地郡管区。所谓“秦并天下为北地郡”,^①即指其事。但是,北地郡的始建时间并非如此,实际是在战国时期秦昭襄王统治年间,始置的具体时间应在秦昭襄王三十六年(周赧王四十四年,前271年)。是年,秦国“起兵伐残义渠[戎国]。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②秦始皇统治时期,在今吴忠市南部、黄河青铜峡东北的平原地带增置北地郡富平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河水“又北过北地富平县西。河侧有两山相对,水出其间,即上河峡也,世谓之青山峡。河水历峡北注,枝分东出。河水又北迳富平县故城西,秦置北地都尉,治县城。”秦汉富平县城故址,《元和郡县图志》载:“在今[回乐]县理西南、富平故城是也。”^③据文物考古调查,其位置在今吴忠市南部、高闸镇的关马湖农场附近。在汉代富平县境,上河峡(今青铜峡)以北的银吴平原段黄河之中,形成一块面积广袤的“河渚”,即河心洲(今宁夏吴忠市西、黄河河心岛陈袁滩及其周边)。西汉惠帝四年(前191)在此“河渚”上增置一个县级建制单位——灵州县,隶属于北地郡。还因该河心洲水草丰茂,西汉政府在洲上开设两个官办养马机构——河奇苑、号非苑。正如《汉书》所载:北地郡管辖十九县,其中,“北地郡富平[县],北部都尉治神泉障。浑怀都尉治塞外浑怀障。莽曰特武。灵州[县],惠帝四年置。有河奇苑、号非苑。莽曰令周”。^④至于灵州县的治所,迄今尚无可考。在《汉书》该段内容的注释中,颜师古曰:“苑谓马牧也。水中可居者曰州(笔者按:此“州”字本意指水中高出水面的陆地,与今“洲”字义同)。此地之在河之州(今作洲)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州(今作洲),又曰河奇也。二苑皆在北焉”。^⑤所谓“二苑皆在北焉”系指河奇、号非二苑分布在“河渚”的北半部。入东汉后,北地郡属县有六,仍旧包括富平、灵州、廉三县。^⑥至西晋时期,北地郡仅管二县,即泥阳、富平,灵州县显然已废。^⑦

东汉时期,北地郡与其属县曾一度内迁至关中平原。“后汉永初五年,西羌大扰,诏令郡人移理池阳。至顺帝永建四年,归旧土”。^⑧汉安帝永初五年(111),因西北地区出现羌人之乱,北地郡与其属县内迁至池阳(故治在今陕西泾阳县西北部)之境,内迁诸县包括富平县、灵州县在内。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北地郡与其属县复迁归旧地,即回到原来诸郡县的管区之内。富平、灵州二县也在此时迁回今宁夏吴忠市南部及西部区域。东汉末期,汉廷失去对今鄂尔多斯高原、宁夏平原、黄土高原北部的有效控制权。该地域的郡县等地方管理机构逐渐解体消失,致使各该区域成为游牧业占主导地位的“羌胡之地”。曹魏、西晋时期依然如此。汉富平、灵州二县之境也是如此,惟富平县再度内迁关中平原。

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大夏国王赫连勃勃在稳固其统治地位后,在那个黄河“河渚”(河心洲)上开发水果园林经济,作为其统治集团专用的水果产业基地。为管理这处王室果园,赫连夏特意在“河渚”(河心洲)营造起一座果园城,作为主管官员的治所。是时,各种果树林带遍

① 《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灵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 《史记》卷110《匈奴列传》。

③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河水》,中华书局2007年版。《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灵州》。

④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后汉书》志23《郡国志》。

⑤ 《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

⑥ 参见《后汉书》志23《郡国五》。

⑦ 参见《晋书》卷14《地理志上》。

⑧ 《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十二·灵州》,中华书局2007年版。

布于河心洲上。果园城的始筑时间,史无明确记载,推测其出现于赫连夏龙升元年至凤翔五年间(407—417)。

赫连夏于432年被北魏攻灭后,其果园城也随之被魏朝接管。时隔四年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太延二年(436),在果园城创建军事镇戍机构——薄骨律镇。正如《太平寰宇记》载:“后魏太武帝平赫连昌后,置薄骨律镇在河渚上,旧赫连果城也”。^①这是魏朝镇守西北边陲的重要军事建制单位之一。其驻地选择在黄河河心洲的果园城,四周水环山绕,颇得地势之险。

薄骨律镇城也就是此前的果园城。同样是坐落在黄河“河渚”之上。正如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所载:河水“又北过北地富平县西。河侧有两山相对,水出其间,即上河峡也,世谓之青山峡。河水历峡北注,枝分东出。河水又北迳富平县故城西,秦置北地都尉,治县城……河水又北,薄骨律镇城在河渚上,赫连果城也。桑果余林,仍列洲上。但语出戎方,不究城名。访诸耆旧,咸言故老宿彦云:赫连之世,有骏马死此,取马色以为邑号,故目城为‘白口骊’,韵之谬,遂仍今称。所未详也。河水又[北]迳典农城东,世谓之‘胡城’。又北迳上河城东,世谓之‘汉城’……河水又东北迳廉县故城东,王莽之西河亭……河水又北,与枝津合,水受大河,东北迳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无水……河水又东北迳浑怀障西,《地理志》:浑怀,都尉治塞外者也。太和初,三齐平,移历下民居此,遂有历城之名矣。南去北地[郡]三百里。河水又东北历石崖山西,去北地[郡]五百里,山石之上,自然有文,尽若虎马之状,粲然成著,类似图焉。故亦谓之画石山也。”^②《水经注》关于黄河在青铜峡以北段河道的记述,表明赫连夏的果园城也名“白口骊城”,北魏太延二年(436)在该城始置军镇之际,取民间口头相传的“白口骊”谐音“薄骨律”作为军镇的名称。直到唐代,赫连夏培植的果树园林依旧长势茂盛。唐后期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载:“其城(笔者按:此指灵州城),赫连勃勃所置果园[城]。今桃李千余株,郁然犹在”。^③《元和郡县图志》的记载表明:赫连夏时期栽植的果树园林,唐后期依然存在,其数达一千多棵,所结果实造福于当地居民;水果种类可知者,包括桑、桃、李等。在薄骨律镇建制存续期间,其管区(今宁夏平原)的农业经济得到长足发展,生产的粮食除满足本地军民生活消费需要之外,还大量支援漠南草原地带的六镇驻军及其家属。^④

延至灵州作为州级建制单位始置之年北魏孝明帝孝昌二年(526),薄骨律镇建制存续约90年之久,其治城始终在赫连夏果园城(白口骊城)。

二、北魏灵州的创建及其治城的位置

正光五年(524)八月,北魏孝明帝曾颁布诏书,欲改北疆诸镇为州,即“诸州镇军贯,元非犯配者,悉免为民。镇改为州,依旧立称”,^⑤但因漠南诸镇出现破落韩拔陵、胡琛、杜洛周等为首的叛乱,改镇为州之诏未及时贯彻实施。

(一) 州级政区灵州的创建

① 《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十二·灵州》。

② (北魏)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河水》。

③ 《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灵州》。

④ 参见《魏书》卷38《刁雍传》。

⑤ 《魏书》卷9《肃宗纪》。

延至孝昌二年(526)北魏撤消军管型的薄骨律镇建制,别置正规的州级建制灵州。《太平寰宇记》载:北魏“孝昌二年,置灵州。按《括地志》云‘薄骨律镇以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淹没,故号曰灵州。初在河北胡城。大统六年于果园[城旧址]复筑城,以为州,即今之州城是也。’……至后周,又置普乐郡。隋开皇初,郡废。炀帝又置灵武郡。”^①这段引文表明两层意思:其一,灵州州级政区名称来源于黄河河心洲之名;其二,灵州建置之初,治所并未选在薄骨律镇城,而是选定在黄河北岸的“胡城”之中。明代《宣德宁夏志》亦谓:“至(元魏)明帝,立灵州,初治河北。后徙治果园所筑城。”^②直到西魏文帝大统六年(540),灵州治才迁离黄河以北的胡城,移驻在故果园城,即在薄骨律镇城旧址重新构筑的城郭。迄唐代贞观中魏王李泰主持编撰《括地志》期间,灵州治城依旧在薄骨律镇故城。由胡城迁至薄骨律镇城,是灵州治城的首次移徙。灵州治在黄河以北的胡城历时约15年,即孝昌二年至大统六年(526—540)。

(二) 胡城、薄骨律镇旧城、旧灵武县城的地理位置

首先,灵州初建之时的治城胡城究竟在今何处?

前引《水经注》继富平故城、薄骨律镇城之后,已述及“胡城”,即“河水又迳典农城东,世谓之‘胡城’”。^③可知“胡城”即汉代兴建的典农城至北朝时期的俗称,位于那时黄河之西。其得名的来历,是此城居民基本是胡人。据《元和郡县图志》:“灵武县本汉富平县之地。后魏破赫连昌,收胡户徙之[于此城],因号胡地城。”^④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胡地城”的“地”系衍文,前人业已明确指出。因此,《元和郡县图志》所谓“胡地城”就是《水经注》所载之“胡城”。当灵州在大统六年(540)迁离胡城之后,该城在较长时间内未建置行政管理单位。至唐武德五年(622),才将灵武县治迁至胡城。《太平寰宇记》曰:“至唐武德五年,移旧灵武县于此,今废”。^⑤从此,胡城之名就被“灵武县”取代。这也是《元和郡县图志》将“胡城”径直称作“灵武县”之原因。

那么,旧灵武县城又在哪儿呢?其实,这座古城在前引《水经注》中也有叙及:“河水又北,与枝津合,水受大河,东北迳富平城,所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今无水……河水又东北迳浑怀障西,《地理志》:浑怀,都尉治塞外者也。太和初,三齐平,移历下民居此,遂有历城之名矣。南去北地[郡]三百里。”^⑥据此可知,秦汉时期的浑怀障城坐落在东北流向的黄河东岸。依据《水经注》所述富平故城、薄骨律镇城、典农城/胡城、上河城/汉城、廉县故城、河水枝津的南北顺序判断,浑怀障故址应在今宁夏陶乐县西南部、黄河东岸兵沟入黄处附近(按:陶乐县今已撤销,其南半部划归今银川市管辖)。而宁夏文物考古人员在兵沟附近发现的秦汉墓葬群遗址及文物(在今银川市黄河东岸黄里岗村与沙泉寨村之间),证明浑怀障故城址当在其附近。^⑦北魏孝文帝太和初年(477),平定三齐(今山东省境),将临淄(今山东淄博市)及其附近的居民迁至浑怀障城,予以安置。正因大批历下民众移居此城,遂俗称浑怀障

① 《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十二·灵州》。

② (明)朱梅撰、吴忠礼笺证:《宁夏志笺证》卷上《属城·灵州》,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82页。

③ (北魏)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河水》。

④ 《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灵州》,第94页“灵武县”、第119页“注释[20]”。

⑤ 《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十二·灵州》。

⑥ (北魏)酈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卷3《河水》。

⑦ 参见杨森翔:《城市记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3、16页。

城为“历城”。浑怀障之名反而被人们渐渐淡忘。北周王朝在历城(即浑怀障)创置历城郡,并创置县级单位——建安县,皆属灵州管辖。隋开皇三年(583),废历城郡,以建安县属灵州。开皇十八年(598),改称建安县为“广润县”。仁寿元年(601),再度更名为“灵武县”。此后,灵武县之名称迄唐代不变。^①可见在周、隋时期,建安、广润、灵武皆是同一个县级行政单位在不同时段的政区名称,其治所始终在历城(浑怀障)。惟在唐武德五年(622),灵武县治被迁至黄河西侧的胡城(即胡地城)。也就是说,北朝至隋朝时期的“胡城”,即唐代武德五年后的“灵武县城”。

澄清这层隐秘的关系,判定胡城的地望就较为容易。据《水经注》文,胡城应坐落在薄骨律镇城西北方的黄河左侧。《元和郡县图志》称:“灵武县(笔者按:即胡城),东南至[灵]州十八里”。《太平寰宇记》亦载:“废灵武县,[在灵州]西北十八里”。^②两书所载灵武县城与灵州城间的方向、里程适相符合。按唐代一里约合540米,唐代十八里约合9720米,折合9.72公里。依此测算,胡城故址应在今宁夏青铜峡市北部的瞿靖镇东南、新林村之地。胡城(唐灵武县城)故址迄明代前期犹存,仍被宁夏镇屯田军士利用。如《宣德宁夏志》载:唐“灵武城,尚存,亦屯军居之”。^③

其次,灵州治在完成首次迁移后的治城薄骨律镇旧城究竟在今何地?

过去,学界一般指为“今灵武西南”,这个大概方位是正确的,只是不够精准而已。2003年5月吴忠市利通区绿地园住宅小区出土一方唐代墓志,依据墓志所载吕氏夫人逝世后于“其年十月十四日,殡于回乐县东原,礼也”的记载,当地学者如白述礼、杨森翔诸先生就反向寻找灵州治城所在,遂将目光投向利通区西部的古城湾村。^④古城湾村在今黄河东侧,因位于黄河弯曲河道之东而得名。而这个黄河湾道之所以被称作“古城湾”,是因为当地曾存在过一座城市,后来被黄河洪水冲毁而仅余古城遗迹而得名。结合《水经注》、《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历史文献的记载,这座业已消失的古代城市应该是明代以前坐落在黄河河心洲上的灵州城,其故址应在今古城湾村西侧。笔者于2010年8月到古城湾村及其西侧黄河河心洲做过实地考察。依据黄河流向、河流地貌与古城湾村所处地势判断,北魏至元代的灵州城故址应在今中古城湾村(古城湾村分作上中下三部分)西侧、黄河河心洲(陈袁滩)东侧的黄河公路大桥之下,古代“河渚”的东部。由于古今黄河水沙条件变化而引起黄河河道东西摆荡移徙,黄河“河渚”在明代初期就被黄河洪水冲蚀掉其东半部,灵州古城也随之消失。而现代河心洲(陈袁滩)当是古代“河渚”的西部残余部分在明代以后逐渐扩张而形成的新河心洲。

更有意义的证据是一张古代地图《西夏地形图》。该地图被当代学者收编在《中国古代地图集》之中,使我们有幸目睹千年前宁夏平原的人文地理分布格局。从此图可见,西夏的灵州、翔庆军同治一城,灵武郡大都督府的驻地也在灵州城;而灵州城恰好处在由黄河主河道与东侧枝派河道围成的河心洲之东南部。值得注意的是,黄河东岔道呈现向东凸出的弧形线段,

^① 参见《隋书》卷29《地理志上·灵武郡》;王仲萃:《北周地理志》卷1《关中·灵州历城郡》,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3—135页。

^② 《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灵州》;《太平寰宇记》卷36《关西道十二·灵州》。

^③ (明)朱梅撰、吴忠礼笺证:《宁夏志笺证》卷上《古迹·灵武城》,第85页。

^④ 参见杨森翔:《城市记忆》,中国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第125—162页;白述礼:《走进灵州》,中国文化出版社2009年版,第1—43、208—212页。

灵州城就坐落在其凸岸南段腰部内侧的河心洲上。凸岸北段河道呈现东南向西北的流向。^①史载:灵州都督府于“天宝元年改灵武郡大都督府。宋咸平中陷于西夏,仍为灵州,号翔庆军,又(改)为西平府。元初为灵州”。^②西夏军队攻陷灵州城是在宋咸平五年(1002)。在《西夏地形图》上并未标绘“西平府”之名,据此判断,该地图反映的是灵州改称西平府之前的西夏人文地理格局和黄河河道自然形势。今天的黄河在吴忠市与青铜峡市间呈现南偏西向北偏东流向,跟宋代此段河道流向存在明显的差异。宋代灵州城所在的河心洲东南部,就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村之西。关于黄河在此地的变迁,俟后另文再论,此不赘述。《西夏地形图》表明: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灵州治城依旧坐落在黄河河心洲东南部(今吴忠市利通区古城湾村之西、今黄河东畔之地)。

(三) 灵州治城从黄河西侧的胡城迁往黄河河心洲薄骨律镇旧城的动因

要解释这个原因,须从北朝的历史大背景论述。在灵州建制创置后的15年中,北魏正从统一的政治局面走向分裂。东魏和西魏对灵州控制权的武力争夺,是导致灵州治城迁徙的主要原因。由此衍生出的影响因素,则是在战争中灵州治城(胡城)被人为地引水灌淹而遭破坏。北魏永熙(532—534)中,形成高欢、贺拔岳为首的两大政治派别。贺拔岳集团活动在潼关以西地区。但是,关西地区的灵州刺史曹泥暗中降附于高欢集团。贺拔岳死后,宇文泰成为关西集团的首脑。魏永熙三年(534)七月,关西集团迎纳西逃的魏孝武帝。同年十一月,宇文泰派遣李虎、李弼和赵贵等将率军进攻灵州刺史曹泥,兵临灵州城(胡城)下,并掘引黄河水灌淹灵州城。围城两个月余。曹泥于大统元年(535)年初向宇文泰集团投降。宇文泰令“迁其豪帅于咸阳”。^③《北齐书》载:大统二年(536)三月,东魏军队万骑袭陷夏州城,“留其将张琼、许和守之”,“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与此同时,西魏灵州刺史曹泥再次叛投东魏。天平三年(536)正月,“西魏灵州刺史曹泥与其婿凉州刺史刘丰遣使请内属。周文围泥[于灵州城],水灌其城,[城]不没者四尺。”西魏军队依旧采用水攻的战法,灵州城(胡城)遭大水淹没,露出水面的城墙仅四尺之高,约折合今度制1米许。在此危急时刻,齐“神武命阿至罗发骑三万,径度灵州[黄河]绕出西军后,获马五十匹。西师乃退。神武率骑迎[曹]泥、[刘]丰,拔其遗户五千以归,复泥官爵”。^④大统三年(537)冬十月,西魏军获得沙苑决战的胜利。此时,东魏夏州守将许和杀其同事张琼,以夏州降西魏。^⑤其后,西魏的北疆形势方得稳定。灵州刺史曹泥叛逃东魏后,灵州城(胡城)仍在西魏控制之下。但是,灵州城的城墙因连续两次遭人为水淹而受到严重的损坏。在勉强维持三年之后,可能鉴于灵州城基础设施损毁惨重,且地势低下不利军事防御,西魏遂于大统六年(540)将灵州治自黄河西侧的胡城迁入重建告竣的坐落于“河渚”东南部薄骨律镇城旧址的新州城。

西魏大统六年(540)迄明代洪武十七年(1384)间,史书未见灵州城移徙的记录。换言之,在这844年间,灵州城始终坐落在今古城湾村西侧的古代黄河河心洲东南部,未曾出现变迁。

① 参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代),图版102《西夏地形图》,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② (明)管律:《嘉靖宁夏新志》卷3。

③ 《周书》卷1《文帝纪上》。

④ 《北齐书》卷2《神武帝纪下》。

⑤ 参见《周书》卷2《文帝纪下》。

究其原因:这个时期,人类在青铜峡以上的黄河河段及其支流流域的土地利用相对适度,青铜峡以上的黄河流域天然植被未罹较大破坏,青铜峡以上的黄河河段的来水来沙条件未出现巨大变化。诸多因素使灵州城所在黄河河心洲维持着长期的相对稳定,灵州治城因此也长期稳定在河心洲东南部。

三、明代灵州治城的三次迁徙

明代初期,由于青铜峡以北的黄河宁夏段河道不断向东移徙,今古城湾村西侧的黄河湾道流水缓慢西移侧蚀,引致灵州治城被迫离开原址,相继三次向东北移建(即第二至第四次),最后固定在今灵武市老城区的位置。

(一) 灵州城的第二次迁建

明洪武十七年(1384),在黄河特大洪水的侧蚀冲刷下,灵州城所在的河心洲因凸岸北段河道不断向西侧蚀推进而急剧缩小,灵州城因坐落在河心洲东侧凸岸南段河畔而被吞噬。这座延续八百多年的灵州城至此遭遇灭顶之灾。据明代志书记载:灵州,“国朝洪武三年,徙其民于关内。十七年,以故城为河水崩陷,惟遗西南一角。于故城北七里筑城,编集原遗土民及他郡工役民夫之忘归者,为瓦渠、枣园、苜蓿、板桥四里,属宁夏卫经历司。又以来王土夷四百[户]有奇,兼调宁夏前卫宋德等六百户,共为十‘百户’,置[灵州]守御千户所,属陕西都司”。^①《宣德宁夏志》所载大略相同,微有差异,即“故城居大河南,今犹存其颓垣遗址,其西南角被河水冲激崩圯。洪武间,筑城于故城北十余里”。^②《嘉靖宁夏新志》与《宣德宁夏志》所载北魏迄明初的灵州城被洪水冲毁与迁建的时间基本一致,即明代洪武年间。而前者详至洪武十七年,更为精确。两部志书对灵州故城的损毁状况和迁徙距离存在分歧。关于灵州故城的损毁状况,《嘉靖宁夏新志》称:洪武“十七年,以故城为河水崩陷,惟遗西南一角。”而《宣德宁夏志》谓:“其西南角被河水冲激崩圯”。两部志书所述怎么会如此相反呢?笔者推断:朱梅在宣德年间主修《宁夏志》时所调查的城址实际是洪武年间迁建而永乐中也被冲坏的灵州守御千户所治城旧址,并非洪武十七年前的灵州城遗址。因此,《宣德宁夏志》所载实误。关于洪武十七年迁建灵州城的距离,《嘉靖宁夏新志》称:洪武十七年,“于故城北七里筑城”;《宣德宁夏志》则谓:“洪武间,筑城于故城北十余里”。两相比较,“筑城于故城北十余里”更为可信,故采信此里程数据。总之,洪武十七年(1384),由于黄河发生特大洪水的缘故,灵州城被洪流吞噬殆尽,“惟遗西南一角”。宁夏官方遂在灵州故城遗址以北十余里的黄河东岸择址建起新的灵州城。^③

如前所论,明洪武十七年(1384)在灵州故城被黄河洪水冲没后,宁夏官方在南距故城十余里的黄河东岸建造一座新的灵州城。此是灵州治城的第二次移迁,两者距离约10余里。第二次移建的灵州守御千户所城位于何地呢?由于明初以降黄河在宁夏平原频繁东西摆荡,今人已难辨其确址。2010年8月,笔者赴吴忠、灵武实地调查期间,在与吴忠市居民交谈中得知,自古城湾村往北约十余里的地方叫“双墩子”,其附近有新华桥村下属的新华二组自然村

① (明)管律:《嘉靖宁夏新志》卷3。

② (明)朱梅撰、吴忠礼笺证:《宁夏志笺证》卷11。

③ 参见(明)朱梅撰、吴忠礼笺证:《宁夏志笺证》卷11。

(原属灵武市,后划归吴忠市)。又据灵武市文管所的负责同志告知,新华二组某户村民在其农地栽植果树时曾在地表以下约1.2米深处掘出青砖和人工凿刻的大条石,判断该处应是一个古城遗址。^①综合历史文献与笔者实地调查所获信息,第二次迁建的灵州城,大体在今吴忠市利通区北部的双墩子村与新华二组自然村之地。令人遗憾的是,第二次迁建的灵州守御千户所城延续至永乐(1403—1424)中再次遭受黄河洪水的侵袭,“洪武间筑城于故城北十余里。永乐间亦被河水冲圯”。^②居民不得安居,遂放弃洪武灵州城,向东北别择地点建造新城。

(二) 灵州城的第三次迁建

永乐(1403—1424)中,二度迁建的洪武灵州城遭洪水而“惟遗西南一角”后,就实施第三次迁建灵州城的行动。但史书对此次灵州城的迁建距离,则语焉不详,没有具体的交待。^③

对于永乐中第三次迁建灵州城后的城址所在,可通过明代中晚期地方志记载反向推算定位。《嘉靖宁夏新志》载:“宣德三年,城湮于河水,又去旧城东北五里筑之。景泰三年,增筑新城”。^④永乐中迁建的灵州所城,也就是宣德三年(1428)放弃的那座“旧城”。因为第四次迁建的宣德灵州城,就是今宁夏灵武市老城区。因此,那座“旧城”(永乐灵州城)位于今灵武市老城区西偏南五里之处。《宣德宁夏志》对宣德中放弃的旧城和迁建的新城有如下对比记录:“宣德间,陈宁阳、海太监奉旨,相度地形,卜沙山西、大河东,西去故城五里余,命平凉卫指挥钟瑄、左屯卫指挥王刚督筑者。地土高爽,视旧为胜。”^⑤即新迁筑的灵州所城比永乐年间迁建的灵州所旧城在地势上更为高爽优越,且“西去故城五里余”。换言之,由今灵武市老城区向西(或西偏南)推移五里之遥,就是永乐中第三度迁建的灵州守御千户所故城所在。据此,其位置略当今灵武市西偏南五六华里的灵武农场一站附近。永乐中迁建的灵州城,成为灵州守备衙门的驻地,并将“灵州守御千户所”改建为“灵州千户所”,隶属于宁夏卫。这标志着其行政层级的下降。^⑥

(三) 灵州城的第四次迁建

三度迁建的灵州城延用至宣德年间(1426—1435),再一次受到黄河水患的侵袭而被放弃。宣德三年(1428),永乐中第三度迁建的灵州城被黄河侧蚀损坏后,宁夏地方官员奏请朝廷批准后实施第四次迁城。如前所述,在放弃永乐中营筑的“旧城”后,向东偏北移动五里之遥,别建一座新城。此次迁城之举,是早有策划的。据《明史》载:宣德“三年,以河患,徙灵州千户所于(旧)城东”。而在《明宣宗实录》中,则对宣德迁城之举的具体原因有所叙述:宣德二年(1427)十一月,“庚戌,宁夏总兵官宁阳侯陈懋奏‘灵州千户所城垣,旧距黄河三里,今河水冲激,切近城下,恐致崩陷,难于守御。城东有地,高爽宽平,请徙城于彼。’上命行在工部遣官覆视,果当徙。俟来春用工”。明宣宗皇帝同意陈懋来年春天兴工迁建的奏请。宣德三年(1428)初,宁夏镇遂将灵州治城由旧城向东挪移五里之余,另行建造之。《明宣宗实录》载:“宣德三年二月……甲子,徙置灵州千户所于城东。先是,宁夏总兵官宁阳侯陈懋奏:河水冲决

① 参见(明)朱梅撰、吴忠礼笺证:《宁夏志笺证》卷11。

② (明)朱梅撰、吴忠礼笺证:《宁夏志笺证》卷11。

③ 参见(明)朱梅撰、吴忠礼笺证:《宁夏志笺证》卷11。

④ (明)管律:《嘉靖宁夏新志》卷3。

⑤ (明)朱梅撰、吴忠礼笺证:《宁夏志笺证》卷11。

⑥ 参见(明)管律:《嘉靖宁夏新志》卷3。

至城下,请徙于城东。命来春用工。至是,城成,遂徙之。”^①此年迁建的灵州千户所新城,即今宁夏灵武市老城区。至景泰三年(1452),对宣德年间迁建的灵州城城区施行扩建,即景泰三年增筑新城也在今灵武市老城区。

宣德之后,驻在新灵州城(今灵武市老城区)的军政机构多有层级升降的变化。弘治十三年至十七年间(1500—1504),曾在该城改置灵州,属陕西布政使司。弘治十七年(1504),撤销灵州建制,“仍为灵州守御千户所,属陕西都司”。^②嘉靖九年(1530),将守备衙门升为分守中路参将府,仍旧驻在灵州所城。

必须提及的是,至明代天启初年(1621),黄河洪水第五次威胁灵州城(今灵武市老城区)的安全。一年之后,黄河已侧蚀冲刷至距灵州西城墙数十武之处(一武为半步)。即时任河东兵备道副使张九德所谓:黄河“其侵城实甚,粤稽洪武甲子迄今,城凡三徙,皆以河故。而河亦益徙而东,自不佞来受事,不一载,去城仅数十武矣”。^③是时,河患形势极为严峻。居民几度夜惊,迁城之声再次于民间响起。惟有张九德力排众议,亲自督工在灵州城西构筑起一道南北走向的石块垒砌的抗洪大堤,历时两年多(天启三年春正月至五年夏四月,1623—1625)而告竣。这道防洪石堤有效地阻遏着黄河洪水的东侵,解除了灵州城面临的水患威胁,也免除了迁建城市之劳。此乃明代著名的灵州抗洪大堤“灵州河堤”。

明代是灵州治城迁徙最为频繁的时期,接踵出现过三次迁城之举,相继有三座灵州城被黄河大洪水吞没或冲坏,从地表消失了。黄河水患是明代灵州城数度移迁的根本原因。而明代黄河宁夏段水患频发的根源,除自然的气候因素外,还在于青铜峡以上的黄河流域土地利用方式的变更及力度的增大、天然植被渐被破坏,由此引起黄河水沙条件的变化等原因。

纵观两千余年的悠悠岁月,作为北部边疆重要城市的灵州城曾经四度迁移其址,因此存在过五座灵州城,即胡城(今青铜峡市瞿靖镇东南、新林村)、薄骨律镇城(今吴忠市古城湾村西侧)、洪武灵州城(今吴忠市利通区双墩子与新华二组自然村)、永乐灵州城(今灵武市农场一站附近)、宣德灵州新城(今灵武市老城区)。历史文献记载表明:灵州城的每一次移徙都跟黄河水患直接关联,无论是人为的水患,还是自然的水患。但对于我们而言,准确判定灵州治城位置及其迁徙的历史真相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真实的古代北部边疆历史进程和边疆历史地理原貌。

(本文责任编辑 侯毅)

^① 《明史》卷42《地理志三·灵州守御千户所》、卷83《河渠志一·黄河》;《明宣宗实录》卷33,宣德二年十一月;卷36,宣德三年二月。

^② (明)管律:《嘉靖宁夏新志》卷3。

^③ (明)张九德:《灵州河堤记》,《朔方道志》卷25《艺文志二·记序上》。

Studies on Modern Trades in Provincial Boundary of Yunnan

..... Lin Wenxun Ma Qi(102)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uring the winding developing process , the scope of modern trades in provincial boundary of Yunnan had expanded , commodity structure was improved , the trade volume increased , provinci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teracted well , which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regional market in Yunnan and the whole southwest area , made Yunnan the bridgehead in China's modern foreign trade.

Key words: modern times Yunnan provincial trade economic change bridgehead

Argument About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the Related Problems of Er Gunie –

Kun(额尔古涅—昆) Li Shuhui(114)

Er Gunie – Kun which refers to the mountains and the intermountain basin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north Tianshan area of Turpan basin in many documents. The legend of two men who flee into Er Gunie – Kun is about Ukuz tribe(乌古斯部族) who speak Turki , has a Homologous relationship with wusun kun molie jiaomi(乌孙昆莫猎骄靡) 's magical experience of being fed by the wolf in 4th year of the reign of Han Emperor Wen (176 B. C.) , which is recorded in some documents , with no relevance to Mongols who speak Mongolian.

Key words: Mongolia Turks Tianshan Erguna river birth land

A New Probe into the Movement of Lingzhou(灵州) Ai Chong(125)

Lingzhou was ever a major city in the northern frontier of China , and moved four times , five cities once appeared. In the 2nd year of the Xiaochang rule during North Wei Dynasty , Boguly town (薄骨律镇) was abandoned and Lingzhou was built , governed Hucheng (胡城) originally. In the 6th year of the Datong rule during West Wei Dynasty , the 17th year of the Hongwu rule during Ming Dynasty , the Yongle rule , the 3rd year of the Xuande rule , Lingzhou was ever moved for other three times.

Key words: Lingzhou Hezhu Hucheng(河渚胡城) the Cheng of Boguly town the Yellow Rive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Social Environment of Northwest Area in Qing Dynasty—Case Offered b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he Causes of Changes of Jinshi(进士) in Qingyang (庆阳) ,Gansu Ma Xiao (134)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decline of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imperial talents , the changes of the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 and social causes in Qingyang in Qing Dynasty. Through comparison with Ming Dynasty , it argues that the transfer of province center caused by the division of Shaanxi and Gansu , the backward academy education and other accidents had a great influence on local economy , society , culture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 which eventually led to the decay of Qingyang's imperial examination.

Key words: Qing Dynasty Qingyang imperial talents time and space distribution